

新时代大国关系与周边海洋战略的调整和塑造

杨洁勉*

摘要: 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也进入了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总体稳定和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逐渐形成,为我国处理周边海洋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与相关当事国的利益博弈、与东盟在多边层面的再磨合,以及与域外大国的战略竞争态势等难题。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新的战略规划,我国需要在战略理论和战略对策方面加以调整,围绕周边海洋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的新整合进程,重新塑造周边海洋问题的区域合作架构。

关键词: 新时代; 大国关系; 周边海洋战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近年来,周边海洋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周边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该问题既涉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在具体议题上的利益博弈,又受到中美关系等大国关系的影响。应把握时代潮流发展的大方向和大国关系的总框架,分析当前我国周边海洋战略问题的多层次矛盾,结合新时代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理念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总体思路,从被动应对周边海洋问题发展为主动塑造周边海洋问题的区域合作架构。

一、建构新时代的大国关系框架

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以及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大国在中国的外交筹划中始终居于重要的地位。保持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和均衡发展是我国的外交工作重点。

(一)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处理

*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上海 200233。

国际关系的共同目标，以共同利益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以共赢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合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① 大国往往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因素，有效管控矛盾分歧，建立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是大国的重要责任。保持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就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基础。首先，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大国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应当超越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旧观念，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其次，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唯有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国际安排才能得到各国的认可和支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既损害国际关系的稳定性，也不利于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性。再次，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大国间应当以合作实现共赢，通过互利合作，协力解决关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问题，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二)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中国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指出：“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② 伙伴关系与结盟存在根本区别，它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中国积极推进大国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已同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法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德国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还同欧盟建立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真正体现了和平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为大国间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创新思路。

(三) 大国关系的框架内涵

中国以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为基础，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致力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首先，利益交汇是大国合作的基础，国家间寻求和扩大利益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经贸合作往往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尽管近一段时间美欧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也应该看到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振兴的优先选项，这就为拓展经贸合作、实现双赢提供了空间。此外，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和世界热点问题，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成为大国利益交汇新的增长点。

其次，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大国关系问题首要的是战略互信问题。协调与合作是增进大国间战略互信的主要途径，这其中就包括了定期首脑会晤和高水平对话磋商机制等。中国已经同各主要发达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战略对话机制。例如，中美从2009年到

① 王毅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学习时报》2016年6月20日第1版。

②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页。

2016年连续举办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与欧盟2017年初在北京举行第七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2017年底，中国、俄罗斯、印度举行了第15次三边外长会晤。中国还不断探索创设新的大国协调机制。2017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做出战略决定，建立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此外，2017年底，中美两国国防部举行了第二次亚太安全对话。

再次，总体稳定和均衡发展。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是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新思路，意在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出发，维护大国关系稳定，综合考虑同各个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一些西方人炒作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走向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大国零和博弈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感上升。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现实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2013年，习近平访问美国与美方达成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高度强调中美关系对于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重要性。^①我国在与各大国发展关系时保持均衡发展，不与任何一方对抗，也不同任何一家结盟。这与我国坚持的“结伴不结盟”的外交理念相一致。保持同各大国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良好合作关系是我国与大国交往的原则。

二、中国周边海洋战略和多层次国际关系

周边海洋问题是当前影响我国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核心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且有理、有力、有节地处置应对了以南海问题为核心的复杂的周边海洋问题，为维护我国周边地区总体稳定，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中国周边外交和周边海洋战略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引领下，我国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周边外交理论，对于中国周边外交布局提出了清晰的构想，并有效地指导了我国的周边外交实践活动。

中国的周边外交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开展同周边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强调“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

①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网，2017年11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09099.shtml>，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3日。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家关系”。^①“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要求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以诚待人、互利互惠、开放包容、共同发展。这种高度概括的外交理念是中国睦邻友好和平外交政策的高度凝聚，对于周边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周边外交将“正确义利观”作为处理周边外交的重要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义利观”是“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活动时，特别重视推动与周边国家在政治上的平等互利、在经济上的合作共赢。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③的主张，并且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将“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④作为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希望通过行之有效的外交行动，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共享利益，共担责任，将中国与周边国家打造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过去5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与周边国家政治合作关系不断提升，经济合作全面深化，人文交流日益紧密，为我国发展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作为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周边海洋问题上也坚决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周边外交思想，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和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作为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任务。我国的海洋战略与周边外交目标一致，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中，作为周边外交与海洋战略的共同组成部分，我国的周边海洋战略主要承担着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对周边和域外国家所挑起的海洋问题纠纷等重要任务。面对周边海洋区域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以南海问题为代表的复杂周边海洋问题的挑战，我国外交和海洋问题主管部门在贯彻周边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制定了清晰可靠的斗争策略，充分利用政治、法律和外交武器，有效管控南海问题，维护了我国周边海洋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二）围绕南海问题的海洋争端与海洋合作

南海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在周边外交领域的严峻挑战之一，围绕着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中国与国际组织以及中国与域外大国关系三个层面形成了复杂的竞合关系，影响着我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②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国周边的战略态势。

第一，双边层面的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具体利益争端。狭义的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围绕着南海岛屿主权、各国管辖海域的海洋划界问题，以及与划界直接相关的海洋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分配问题的总称。^①在这一层面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五个东南亚国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此外，东南亚五国相互之间也在海洋划界和岛屿主权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围绕着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问题，各国在双边层面形成了复杂的矛盾与利益冲突。

第二，多边层面的南海问题影响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新磨合。东盟并不是南海问题正式参与方，但作为东南亚区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参与南海问题，始终是东盟一贯的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盟就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并且在推动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菲律宾等国试图利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形成对抗。部分东盟国家也希望以多边方式掌控南海形势发展，提升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东盟多次尝试以共同声明等方式在南海问题上一致发声，并且还主动拉拢域外大国参与南海问题，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这种状况给南海问题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给东盟自身的发展埋下了隐患。^②幸运的是，2016年7月以后，南海问题逐渐降温，东盟内部在相关问题上也逐渐形成共识，中国与东盟也于2017年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协议。中国东盟关系也终于渡过了这段艰难的磨合时期，逐渐回归稳健发展的轨道。

第三，全球层面的南海问题反映了中国与域外大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南海问题的演变具有重大的国际背景，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将南海问题作为参与亚太事务的战略支点，利用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重新加强同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的联系，构建地区海上盟友网络，并积极利用亚太地区的既有安全问题，为美国“重返亚太”寻找战略支点，而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复杂的南海问题，就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着力点。2012年后，美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鼓动菲律宾、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做出各种挑衅行为，使其成为美国南海政策的马前卒；一方面积极在国际舆论中炒作南海问题，并且通过南海巡航等方式向中国施压。以这种方式分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并通过议题炒作迫使部分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进一步被纳入美国战略轨道中来。^③此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欧盟等国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南海问题，域外大国的参与使得南海问题成为大国地区博弈的焦点问题之一，严重影响了南海

① 贾宇 《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28页。

② 葛红亮 《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评析》，《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66—80页。

③ 周琪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23—44页；焦世新 《“亚太再平衡”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调整》，《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第64—89页；信强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第51—68页；蔡鹏鸿 《美国南海政策剖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第1—7页。

问题的解决和中国周边区域的稳定。

总的来说，尽管在 2016 年 7 月以后南海问题因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是其核心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各种矛盾仍有可能再次激化。如何应对复杂的南海问题对我国周边海洋形势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周边外交工作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三、中美关系和海洋战略

随着世界海洋局势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中美两国的海洋战略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向海洋强国迈进，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反观美国，其海洋战略在形式上虽是翻新，但其本质却愈发保守。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用“印太”取代了“亚太”，从官方的战略层面明确了“印太”的地理边界“从印度洋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同时，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Rival Powers)，并认为“中国试图颠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扩展其国有经济模式，重构地区秩序。”^①其背后所透露的是美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恐惧，也表露出美国对其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忧虑。

(一) 从“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虽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某些作法提出异议，并不再公开提及此战略，但其内核却被保留了下来，并用新的“印太战略”命名之。以“印太战略”取代“再平衡”战略，逐渐构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核心，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印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继承与发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先是在 2017 年 10 月访问印度时确认“印太”概念，特朗普 11 月的亚洲之行多次提及“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就“印太”提法取得共识。当前，“印太”已取代“亚太”，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足见“印太战略”之地位。

第二，“印太战略”加速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架构的转型。自二战后，不同于美欧之间的多边同盟体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核心、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轴辐体系”。但是，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相对衰弱，美国凭一己之力维系原有的“轴辐体系”感到力不从心，于是要求盟国承担地区安全责任、分享地区安全负担、共享地区安全利益。美国的安全体系从“轴辐体系”向多边化、网络化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日本的“次轴心”^②地位更加突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盟国间的军事合作，提升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地位，积极推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p. 4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visited on 25 Dec. 2017.

^② 信强 《“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4 期，第 52 页。

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出炉亦有推动作用。

第三，“印太战略”加大了美国与其盟友在亚太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矛盾。当前，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架构只在地缘政治层面起到了稳定盟友及伙伴国的作用。但相较于安全层面，特朗普政府并未在亚太地区提供新的地缘经济战略，反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至少暂时放弃了构筑亚太多边经济框架的努力，导致“印太战略”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失衡。

第四，“印太战略”预示着中美战略竞合关系进入“新时代”。首先，“印太战略”重塑了中国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在“亚太”的地缘视角下，中国仅是太平洋西侧边缘的大国，较日本更为遥远。而在“印太”视角下，中国居于中心位置，且处于日、印、澳的包围之下。同时，将中国置于战略中心的定位，既是“再平衡”精神的体现，也是“再平衡”手段的映射——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其次，“印太战略”加大了中国在地区安全上的压力，从北方的黄海(朝核危机)到台海，到东海(钓鱼岛争端)再到南海，都将给中国解决争端带来新的考验与困难。最后，“印太战略”还将对“海上丝路”的建设带来政治压力。“印太战略”的地理框架有很大一部分与“海上丝路”沿线相重合，美国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而域内国家需要美国维护地区秩序。^①所以，美国利用其业已存在的政治优势，对中国“海上丝路”建设形成阻滞，遏制中国将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是其“印太战略”的基本战略目标之一。

(二) 中美海洋战略的分歧和磨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②中国的周边海洋战略立足于发展海洋经济，不断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保障实施海洋及其资源开发的安全环境。美国的“印太战略”则是维持其海洋霸权和阻滞中国发展的战略。具体来看，中美海洋战略的分歧和磨合主要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

在全球层面，中美之间的分歧从地区向全球领导力延伸，内涵从话语权向规制权转移，竞争点从中低端领域向高科技部门转移，范围从双边向第三方和多边机制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③这是美国对华战略本质的真实写照。

在地区层面，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和交替升温。美国维持地区传统同盟体系的能力下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p. 4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visited on 25 Dec. 2017.

^② 《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新华网，2013年7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31/c_116762285.htm，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0日。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p. 4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visited on 25 Dec. 2017.

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导致安全 and 经济两大地区战略抓手失衡，中美战略磨合与竞争的重点由东南亚向北转移，朝核问题成为地区国家间以及中国与美国等域外国家关系的主要变量。南海问题出现缓和迹象，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不再将所谓“南海仲裁案”作为筹码，南沙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共同维护的“双轨思路”^①得到进一步体现，“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也顺利达成，但随着各方执法、巡航等活动的幅度增强，突发事件的处理和应对可能成为海上博弈的主要方面，甚至不能排除其他国家在相关涉海问题上援引裁决结果，甚至效仿此案将其他争议提交国际司法仲裁程序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后遗症。因此，积极推动完善中美四大高级别对话机制，用好首脑外交的契机阐明各自在高度敏感性议题上的基本原则及政策底线，是避免中美在海洋问题上产生战略误判的关键。

（三）中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应对

事实上，中美两国对“新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而美国则认为新时代是“竞争的世界”（Competitive World）。^② 中国的心态更加积极，而美国的心态愈发保守。时代认知的差距，必然导致战略行为的分歧。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仍是“接触与遏制”，在“印太战略”基调下，对华遏制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反之，中国在应对美国充满“冷战思维”的战略模式之时，不可陷入其战略框架，要跳出其战略陷阱，发挥自身的战略优势。在美国人讲斗争的时代下，中国更要宣示和平的重要性，中国在海洋战略上要有自己的新思维与新模式，并形成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

第一，在战略理论上，中国特色海洋战略超越了西方海权理论。首先，西方的海权理论有其时代局限。西方的海权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为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所形成的理论。马汉版“海权论”的哲学根源受古希腊雅典海军传统及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影响颇深，且总结英法百年战争之经验，遂成一家之言。后世，无论英国人科贝特还是苏联的戈尔什科夫，都基于海陆争霸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一套基于争权夺利的海权观点。其次，西方海权理论的存在前提是一个“霍布斯式”争权夺利的世界，是当前国际海洋秩序不平等不公平的体现，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不符，亦与我国所倡导的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违背。最后，当代海洋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海上反恐、反海盗等问题，都需要合作而非斗争。

第二，在战略思维上，中国特色海洋战略发扬和平合作的传统。600年前，郑和曾率领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跨越南海，渡过马六甲海峡，途径印度、红海及东非海岸。此番远航既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以和平之姿开展经贸文化交流的旅程，与后世的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叩关形成鲜明对比。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马来西亚时曾撰

① 《王毅“双轨思路”是解决南海问题最为现实可行的办法》，外交部网站，2016年4月21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57479.shtml>，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0日。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p. 4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visited on 25 Dec. 2017.

文指出“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七下西洋，五次到访马六甲，在中马两国史书上留下丰富的记载，三宝山、三宝井和许多美丽的故事广为流传。这首先归功于郑和当年的‘有所为’。据记载，他在这里敦睦邦交、发展贸易、帮助当地军民修筑城墙，驱逐海盗、平息冲突、维护海上安宁、传播农业、制造、医学等生产生活技术。从后世的角度看，中马交往这段佳话的特别之处，还在于郑和的‘有所不为’。他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来到这片富庶之地，并没有搞掠夺，也没有搞扩张，更没有搞殖民，留下的是当地传颂了几个世纪的善举和义举。不仅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实现了‘己欲达而达人’。郑和维护正义、兼济天下的事迹，正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思想精髓，也是地区国家绵延至今的共同精神财富与文化基因。”^①概而言之，“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郑和精神”是中华民族海洋实践中的珍贵历史遗产，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当代，发扬与继承“郑和精神”既是中国海洋外交中“和平理念”的历史传承，也有助于中国特色海洋战略更好地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在战略行为上，中国特色海洋战略需要以合作为根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首先，中国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海洋安全机制。在应对朝核危机、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安全议题时，利用逐渐推进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机制等对话谈判经验，积极应对潜在挑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反海盗、海上反恐等议题上，构筑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中国的大国责任。其次，要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战略平台，进一步夯实海上经济合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促进海洋经济、环保、灾害管理、渔业等各领域合作，使海洋成为连接亚洲国家的和平、友好、合作之海。”^②最后，要积极构建海上人文交流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出去与异质文化的引进来，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开展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排除误解，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③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④这些都是维护我国蓝色国土和海洋权

① 《李克强：历史的航道 崭新的坐标 扬起的风帆》，中国商务部网站，2015年11月20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1/j/201511/20151101190125.shtml>，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0日。

②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0日。

③ 《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新华网，2013年7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31/c_116762285.htm，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0日。

④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18日。

益、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指导方针。随着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不断上升，我国面临国际海洋秩序深入发展、自身海洋利益持续拓展和各国海洋利益深度磨合的新变化。一方面，中国将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努力稳定包括海洋问题在内的大国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推动区域互联互通规划，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扩大双赢、多赢、共赢意识，开创互补、互联、互通模式，坚持陆海统筹，使六大陆上经济走廊建设与“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中国—北冰洋—欧洲”三大蓝色经济通道^①相互衔接，推进区域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促进各国在海上的蓝色经济、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合作，凝聚周边安全观念共识，推动构建陆海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和周边安全共同体，使周边海洋合作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China's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and Periphery Maritime Strategies: Dealing and Shaping in the New Era

YANG Jiemian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stract: Inspired and guided by the CPC 19th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is striving fo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for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a is working at a framework for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featuring overall stabi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China is confronting both opportunity to handle maritime issues in the periphery and challenges such as disputes with the claimant states, re-adjusting multi-layered relations with the ASEAN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outside powers. In face of the new strategic plan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needs to make relevant adjustments in strategic theories and policies, start a new round of gearing-up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shape regional cooperation architecture for the periphery maritime issues.

Key words: New Era;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Periphery Maritime Strategy

●责任编辑：屠 苏



^① 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新华网，2017年6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20/c_1121176798.htm，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0日。